

# 「克己復禮為仁」爭論平議

● 孫國棟

《二十一世紀》第8、第9、第10，三期連續刊載杜維明、何柄棣、劉述先三教授因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一語的解釋不同而起激烈爭論的文章。讀後頗有所感，謹稍抒鄙見。

三教授爭論的緣起由於何教授指杜教授將《論語》孔子答顏淵之問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中「克己」一詞解釋為「克服自己」，進而將「克己」等同於「修身」，只強調禮的積極意義，而忽略禮的消極約束意義，是無異將帶有抑壓性、克制性的禮，轉化為抒發性修身的禮，違反了孔子「克己復禮」的原意。何教授說這是由「量變一躍而為質變……先從突破口轉小彎，隨着轉大彎，直轉到一百八十度與古書原文重要意義完全相反。」

何教授又徵引匡亞明《孔子評傳》來解釋孔子「克己復禮為仁」說：

在孔子看來，統治者不能自我克制生活上的侈靡、政治上的僭越，要實行仁政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孔子主張克己復禮，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慾望，恪守周禮，不能越軌……克己是復禮的

前提，不克制生活上的侈靡、政治上的僭越，就無法恢復到禮樂有序、天下有道的局面。克己復禮主要是對統治階級說的，即要求統治階級提高遵守周禮、行仁政的道德自覺性。

何教授更從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載孔子對楚靈王因奢僭驕虐卒至自縊而死的評語：「仲尼曰：古也有志，克己復禮仁也，信善哉，楚靈王若能如是，豈其辱於乾谿？」證明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一語，源出於「古志」，乃指抑制奢僭無禮而言，並無積極修身之意，於是指出杜教授解「克己復禮」為修身，是「語境」跳躍。何教授更說：「當代新儒家對古代思想的詮釋比任何前代學派都離譜……很多謹嚴的學人，對之都相當懷疑，甚至不少人認為它內中不乏欺世的野狐禪。」因此引起杜、劉兩教授的反駁。

平心而論，杜教授釋「克己復禮」只闡揚積極修身一面而遺漏抑制一面，的確有不足之處。但因此而指其與原文意義完全相反，則不免過甚其詞。

平心而論，杜教授釋「克己復禮」只闡揚積極修身一面而遺漏抑制一面，的確有不足之處。但因此而指其

與原文意義完全相反，則不免過甚其詞。劉教授對此已有辯釋，本文不再引述。至於何教授徵引《左傳》所載孔子之語，以駁杜文之說，在方法上亦有瑕疵。因為(1)「古志」的話，只據《左傳》所引，原意難明，不宜即指其為純抑制性。(2)楚靈王奢僭驕虐，孔子徵引「古志」以責之。謂孔子僅責其不能抑制奢僭，亦揣度之詞而已，《左傳》更無其他資料可以佐證。究竟孔子有無更責其不修身失德之意則未可知。(3)孔子評楚靈王時年二十二歲(據何教授考證)，而答顏淵之間已在中年，孔子中年以後對「仁」及「禮」之觀念如何，現《論語》中載孔子論「仁」論「禮」各有數十條之多，何教授不從《論語》以探求孔子當時思想的真義，而援引《左傳》不詳涵義的「古志」及毫無旁證的孔子之言以為證據，豈非方法上有瑕疵？歷史上同一「名物」因時間不同而有異解，思想史上一詞一語的內涵演變更速，豈宜以前一時期的思想內容證後一時期的思想內容？

何教授認為匡亞明的《孔子評傳》是研究孔子最好的書，於是引匡亞明的話：「克己復禮主要是對統治階級說的，即求統治階級提高遵周禮、行仁政的道德自覺性。」這番話如果用在西周「刑不上大夫、禮不下庶民」嚴格劃分社會階級的時代是對的，但到了春秋晚年孔子時代，階級制度已開始動搖，匡先生以此話來解釋孔子的「克己復禮」就不適當。因為孔子正是突破社會階級的先驅者。他的「有教無類」就是突破階級的明證。何教授既盛讚孔子的「有教無類」，並自述為了發揚孔子「有教無類」精神，自己是「用功最勤、用盡可能最多統計、最多種資料的詮釋者和證明者。」(見第

10期〈再論「克己復禮」的詮釋〉)可見何教授承認孔子的施教已超越階級。孔子的教育，以詩、書、禮、樂為內容，三千弟子既非統治階級，弟子之間更無貴族與平民之分，都學禮、習禮。在孔子觀念中，禮是人人行為的重要規範之一，決不為貴族階級、統治階級所專利。匡先生以西周時的社會背景，而論春秋晚年孔子的思想，是否適合？何教授既肯定孔子「有教無類」，卻引匡先生這番話來詮釋孔子論禮思想，豈非自相抵觸？

《論語》〈八佾篇〉：「子夏問曰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？』子曰：『繪事後素。』曰『禮後乎？』子曰：『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已矣。』」

劉述先教授引用這段對話來說明孔子徵引古書並不拘泥原來意義，反而鼓勵學生作啟發性的思考。劉教授的解釋稍嫌簡略，未能盡意，以至何教授誤會說：「劉教授對孔子子夏師生對話毫未能作出任何詮釋和分析。」原來何教授把「禮後乎」的「後」字錯誤解釋為時間上出現的先後，於是講了一段毫不相干的話。他說：

姑且按照劉先生意思把「克己復禮」的禮和「禮後乎」的禮視為等同。前者既由孔子講明是出自古志，此語中的禮一定比孔子古。此語既言及「復禮」，這須要恢復的禮一定比古志還古，比孔子更要古得多。這樣古的東西，怎麼子夏會認為是後起的，而且得到孔子的讚賞呢？用初中英文文法作比，怎麼過去式、過去完成式會比現在式、現在進行式更「後」呢？豈不是孔子(事實上是劉教授)自打自己的嘴巴嗎？

(見第10期〈再論「克己復禮」的詮釋〉)

《論語》這段對話的「禮後乎」不是指禮出現「時代」的「後」，而是指表現於行為上層次的先後。孔子認為人先有忠信之質，然後再用禮以文之。這正是孔子賦禮以仁的新精神的一貫主張。孔子所以稱讚子夏，因為子夏能了解禮是外表的文，忠信（或仁）是內裏的質。先具忠信之質，然後加上禮文，所以說「禮後」。何教授錯解「後」是指時間先後的「後」，是一大疏忽。

我覺得劉教授提出論語這一條，最適當是用以說明孔子「仁」與「禮」的關係觀念——一為內質，一為表文。修身必須表裏合一，不能只顧表面的禮節而缺乏內在的仁心，亦不應只有內在的仁心而不顧外面的禮節。這是孔子將古代的禮注入新精神的說明。

《論語》中有關這類的提示很多，如：

子曰：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。  
〈衛靈公十五〉  
子曰：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  
〈八佾第三〉  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「大哉問，禮與其奢也寧儉；喪與其易也寧戚。」  
〈八佾第三〉

林放認識到禮有所本，所以孔子極讚賞他。奢與儉雖都不適當，但奢近於注重外面的表現，儉則較近內情，故寧取儉。喪禮與其節文習熟，不如真正哀痛動情。所以說「喪與其易也寧戚」。

在《論語》中，孔子常將內質與外文對舉，可見孔子觀念中之「禮」，必須有內心的真情。故求實踐「禮」，不能只講消極的克制而不理會真情的培育。這種內與外、質與文雙修的態

度，孔子是特別注意的。所以說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；文質彬彬然後君子。」（《雍也第六》）

何教授認為禮是「具有頑強約制性的」。又說「孔子對『克己』的看法只可能是字面的、常識的『克制自己』的種種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，決無解為『修身』及其延伸之理」（第8期〈「克己復禮」真詮〉）。如果把「克己復禮為仁」一條從整部《論語》中抽離出來，只是一句獨立的話，則何教授的解釋是可以成立的。如果把這一條問答放在論語中，與論語的整體精神連結起來觀察，則何教授的解釋必遺漏一些涵義。我們研究古人思想，固然不應以自身所薰染之學說推測古人的主意，而專務尋求歧出之義以演繹自己的思想，牽古人以就我。亦不應劃地自限，死守一字一句的表面意義，而忽略古人思想之精義內蘊，割裂古人的思想。統觀《論語》二十篇，從各方面顯出，孔子之精神必兼顧內與外、裏與表、質與文。不可能只重外表的克制而忽視內面的培養。論語是一部孔門師弟間言行的紀錄，出於眾弟子之手，不是一部有嚴密系統的著作，所以用辭遣字並不謹嚴，有時就其辭的廣義而言，有時就其辭的狹義而言。而且各弟子的質性不同，學養參差不等，身分背景不齊，問答時的環境相異，各記所言所聞，未必每條記載都意義完足，所以要探求孔子思想的真義，必須從各樣紀錄、各種角度，綜合而觀之。如果只從一條一句「字面的」、「常識的」去理解，很難把握孔子說話的真義。

禮除了約制僭越無禮的慾望言行之外，似乎更有調節一切行為使其適中、不過不失的意義。《論語》〈泰伯篇〉：

「禮後乎」不是指禮出現「時代」的「後」，而是指表現於行為上層次的先後。孔子認為人先有忠信之質，然後再用禮以文之。這正是孔子賦禮以仁的新精神的一貫主張。

我們研究古人思想，不應以自身所薰染之學說推測古人的主意，亦不應劃地自限，死守一字一句的表面意義，而忽略古人思想之精義內蘊，割裂古人的思想。

子曰：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葸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

恭、慎、勇、直都是美德，不是僭越的慾望，仍須調節之以禮，使之適度。所以孔子時時以禮樂並舉。如：

子曰：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。

〈泰伯第八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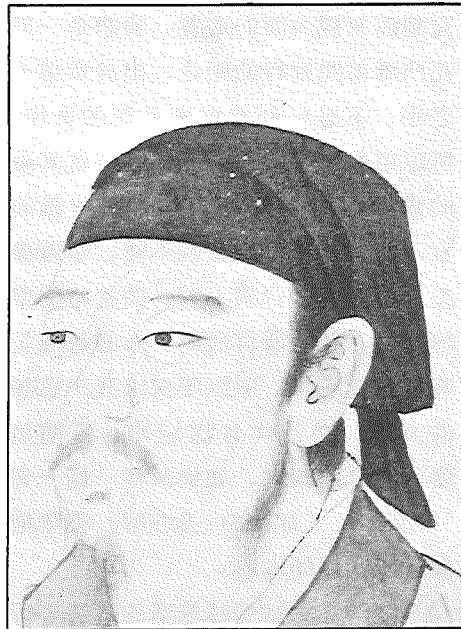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、公綽之不欲、冉莊子之勇、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

〈憲問第二〉

「文之以禮樂」，就不是只有「頑強制約性」，而更有調節身心行為之意。我這說法，何教授不至認為又是「先從突破口轉小彎，隨着轉大彎，直轉到一百八十度與古書原文重要意義完全相反」罷？

孔子之後，孟、荀兩大儒成為儒

以荀子思想釋孔子之「禮」與「仁」，恐有未盡之意。



學的兩大系。《中庸》舉出「尊德性」與「道問學」兩項目，正可表現這兩系思想重點之不同。孟子主性善，故重「尊德性」；荀子主性惡，故需賴後天的學力而節制之以禮，重「道問學」。孟子之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乃「千古不可同之異，亦千古不可無之異」。何教授重荀輕孟，所以稱荀子「集先秦儒家思想大成」。但中國二千餘年來學者多推孟學更為主流。宋明儒學以發揚孟學為多，當代的新儒學，亦闡揚孟學為多。孔子思想，涵蓋孟與荀，何教授欲偏以荀子思想釋孔子之「禮」與「仁」，恐有未盡孔子之意。荀子云：「禮者養也。」又云：「孰知夫禮義文理所以養情也。」（《荀子》〈禮論〉）然則何教授恐亦未盡荀子之意。

本文探討孔子「禮」的觀念，全以《論語》中孔子之言為根據，不旁及其他文獻。因為其他文獻常會增減孔子的原意。

本文以對何教授質疑較多，皆出於對學術認知的真誠，不敢有私意存乎其間。我早年曾治唐宋社會史，何教授是治中國社會史的前輩，對明清社會史用功之勤、致力之深、創獲之多，我是非常欽佩的。尤其何教授於兩度退休之後，仍「致力於整合古今，加深瞭解目前中國主要癥結的歷史根源，並探求解救之道。」此番胸襟抱負，使我肅然起敬。但為學術之求真，不得不對何教授直言無隱。

1992年5月20日於美西